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含章集


 Thirty Years
 复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张汝伦◎著



Thirty Years

含章集

张汝伦◎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含章集/张汝伦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799-5

I. 含… II. 张…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2339 号

含章集

张汝伦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75 字数 327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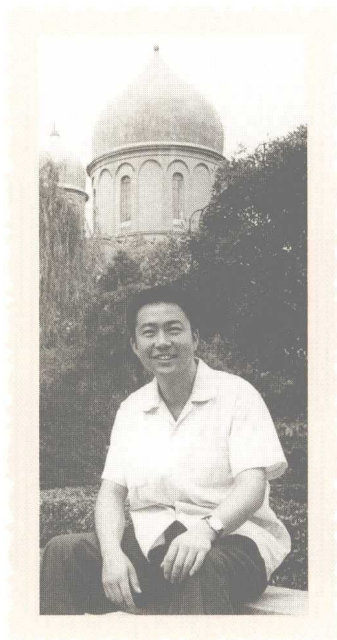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99-5/C·189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979年,上海

30

THIRTY YEARS / Zhang Rulun

张汝伦



1983年,北海



1987年,桂林

30
THIRTY YEARS Zhang Rulun
张汝伦



1989年,柏林



1990年,旧金山

30

THIRTY YEARS / Zhang Rulun

张汝伦



2005年,浙江余姚王阳明墓



2007年,成都

30

THIRTY YEARS Zhang Rulun

张汝伦

自序

陈寅恪

个人文集已编过多次，这次却有些许感慨，因为这个文集系列要求收集从作者 1977 年高考到今年这三十年间的文章，且是逐年收录，这就不仅是在编个人文集，而且有盘点人生的意思了。因为这三十年，无疑都是入选作者人生最好的岁月。拿我自己来说，这本文集第一篇文章发表于 1983 年，正当而立之年，如今却已两鬓染霜。

我们这代人当初跨入大学校园时一个个踌躇满志，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如今不少人在别人或自己眼里看来，要算是“成功人士”。然而，对一个读书人来说，什么算是成功？陈寅恪先生名满天下，学问堪称一代宗师，不仅为学界同侪所敬仰，且官方亦不得不予以礼遇。至于教授、院士之类的头衔，更是不在话下。但他晚年在回顾自己生平时，并不觉得自己“成功”：“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唯独觉得“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们这代人在学问上大概难及寅老于万一，是否也能如他那样“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呢？在编此文集时，此一问题，不免萦绕于心。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剧烈程度，不亚于近代的历次革命，某些地方甚且过之。在此情况下，与历史上任何大变动时期一样，读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态度，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尽一切可能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变化，纵然做不成挺立潮头的弄潮儿，也至少能与世沉浮，不至于“被时代抛弃”。另一类则不然。采取这类态度的人，大都相信天地有常道，他们读书为学，无非求此道、守此道、传此道。此常道对他们而言乃“余心之所善”，不能因外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即使因此而对自己不利，也“虽九死其犹未悔”。只是在普遍相信进化论的现代，这样的态度已不容易见到了。但我以为，要真正了解一个时代，这两种态度的人的观察都是不可缺少的。

这套文集系列丛书的策划者要求不要多选学术文章，而要“多选一些读者关心的、反映社会变化与公共领域相关的文章。”这个要求不能说不合理，的确不能要求

一般读者都去读讨论专门学术问题的专业论文,读者希望读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的文章。按照时下流行的理解,写“反映社会变化与公共领域的文章”的人可以叫“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舶来的名词,与所谓专业知识分子相区分。学术专业化和学院化后,出现了一批批“专家”,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与此相反,有些人对现实世界种种问题的兴趣远过于对专业的兴趣,经常对各种大家关心的现实问题发表意见,这样的人就被叫做“公共知识分子”。

可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事事关心是读书人的本分;处士横议是读书人的天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读书人的志节。在古代社会,诤钉章句之徒未必有多少人看得起,而所谓醇儒,则非有悲天悯人心怀者不可。把读书人分为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两类,就如同把学术和思想打成两橛一样,本身是现代性的产物。唯其如此,我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且为同行所承认,如美国的乔姆斯基、萨义德;英国的罗素;法国的萨特、雷蒙·阿隆、福柯、德里达;德国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一个专业不精通,本行书都没读好的人,不如称为“公共意见分子”,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不要说一般知识,他们的本行知识也是不够的,他们谈的充其量只是社会的流行意见。

其实,“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称完全没有必要,读天下书,谈天下事,本来就是读书人的天职。读书人对众所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并非思出其位,也丝毫不会影响他作为读书人的身份。我自以为还可算是一个读书人,生活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自然也不免会对一些公众关心的事情发表看法。这些看法很可能是读书人的偏见。读书人未必是真理的垄断者,但可以是真理的分有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本文集选的都是时论一类文章,相反,即便是有关时事的文章,也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写的,不是简单的发表意见。专门的学术论文自然也必须选,一来便于读者对这个读书人的专业能力可以有一基本的判断;二来我主要的出版物还是以学术作品为主。对作者本人来说,选编这些论文的过程等于把这几十年求学、为学的过程又重历了一遍。结果发现,自己的主要学术兴趣和对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吾道一以贯之,没有太大的变化。是耶?非耶?以俟读者。

辛亥革命九十九周年纪念日于上海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八三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辨 / 1

一九八六

文化研究三题议 / 10

多元的思维模式和多元的文化 / 21

一九八七

作品是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兼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 29

一九八八

《张汝伦集》序 / 43

一九八九

到事物本身 / 46

一九九一

文化的语言视界 / 52

一九九三

认真地思想和生活 / 84

一九九四

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 / 89

一九九五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君勱 / 95

一九九六

生活世界和文化间理解之可能性 / 118

一九九七

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 / 126

一九九八

理解严复——纪念《天演论》发表一百周年 / 131

一九九九

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 / 146

二〇〇〇

中西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和条件 / 157

二〇〇一

恐怖主义的本源 / 168

二〇〇二

良知先于理论 / 179

现代中国哲学的自觉 / 188

二〇〇三

关于海德格尔的两个批评 / 204

二〇〇四

实践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质 / 216

二〇〇五

我国人文教育的现状及其出路 / 225

二〇〇六

论《哲学贡献》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地位 / 232

再论人文精神 / 250

二〇〇七

《论语》对于现代教育的意义 / 260

二〇〇八

国学与当代世界 / 269

二〇〇九

从教化到启蒙——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 / 279

二〇一〇

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 / 290

附录一：在真理的路上 / 299

附录二：张汝伦著译目录 / 305

一九八三

纪事

我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现代西方哲学”，这在当时是最热门的哲学研究方向之一，因为其时在弥漫整个社会的西学热中，现代西方哲学是热中最热。在大学校园，不管学什么专业的，不谈几句萨特和存在主义，几乎就不能算是上了大学。几乎在所有的学生宿舍，都能找到几本现代西方哲学的书籍。可我却觉得为学得系统且循序渐进，没有古典就没有现代。因此，我读硕士生期间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读西方古典哲学的著作，康德自然是重点研读的对象。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康德本人并未说过他的哲学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把他自己的哲学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于是，在进一步阅读有关材料和思考的基础上，写成了这篇文章。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辨

长期以来，“哥白尼式的革命”一直是康德研究中激动人心的字眼。许多研究康德的学者在论述他的学说时，都要提到他的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下只是国内外一些比较突出的例子：

杜威在其所著的《确定性的寻求》一书的第十一章，即标题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那一章一开头就说：“康德自称他在哲学中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①。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也说“在第二版序言（指《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作者注）里他自比哥白尼，说他在哲学中完成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②。S·亚历山大也断言：“康德自己把他信为正在实现的革命，标志为哥白尼式的革命”^③。

在国内，陈元晖同志在其“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一文中曾讲过“康德……自诩他在哲学上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④。李泽厚同志在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也写道：“康德提出‘自我意识’作为认识的主观能动性的轴心，否定了旧唯物主义的静观反映论，曾自比是哥白尼式的革命”^⑤。

以上这些说法，几乎已成定论。但是，哲学史的研究同一切其他的科学研究

一样,最高仲裁者应该是客观历史事实。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历史事实。

一

黑格尔和康德基本上可说是同时代人。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康德哲学,但一次也没有提到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熟悉,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F·梅勒编的有着相当详细索引的康德著作版本中,也找不到“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字样。事实上,在全部康德著作中,康德一共只两次提到过哥白尼。这两次都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以下简称“批判”)。让我们来看看康德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数学和自然科学由一突发的革命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在我看来,足以使我们去考虑,那使这些科学得益匪浅的变化了的观点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它们的成功应该使我们想要(至少用实验的方法)模仿其进程——在其同为理性知识,可以类推及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以往一直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和对象一致。但借概念,先天地建立关于对象的东西以扩大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种种企图,由于这假定而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们必须尝试,如果我们假定对象必须和我们的知识一致,是否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会更成功。……于是我们的进程正与哥白尼最初的思想相同。由于根据“一切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的假定的解释天体的运动方面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哥白尼于是试验:假定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他是否更能成功。同样的试验也可以在形而上学中进行……^⑥

同样,天体运动的根本法则,使哥白尼最初仅假定作为一种假设者建立了确定性,同时又产生了不可见的宇宙联结力(牛顿引力)的证明。如果哥白尼不敢用与感官相反,但却是真实的方法,即不在天体内探求而在观察者中探求所观察的运动,则不可见的宇宙联结力永远不能被发现。与这个假设相类似,在“批判”一书中所说明的观点方面的变化,我在这篇序言中仅作为假设提出,以使人注意这种变化的初步尝试的性质,但在“批判”正文中,它将由于我们空间时间表象的性质和知性的基本概念而被证明是必然的而非假设的。^⑦

从上面这两段引文中,我们至少可以先得出这样的结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字样从来没有在康德的著作中出现过,康德既没有自称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没有把他的哲学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当然,这两段引文在逻辑上是否有类似的内涵,我们再往下分析。但是,首先应该按照康德著作字面的本身意思去读康德,“他说的是什么”的问题应该先于“他意思是要说什么”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前者属于史科学和语文文献学的范畴,后者属于解释学的范畴,前者涉及的是历史材料和事实,后者则是后人根据前者作出的推论或猜测。在哲学史的研究中,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的区分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二

那么,“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说法究竟又是缘何而起的呢?

也许有些人看到第一段引文中的“革命”的字眼,就轻率地认为那就是康德说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了。康德自比“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说法,很有可能源出于此。但是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批判》第二版序言,这个问题不难找到答案。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康德所说的那个使数学和自然科学“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突发的革命”,不是指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革命。康德这里说的自然科学,从他在同一序言中举的两个例子来看,指的是物理学和化学。有科学史常识的人一定会知道,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革命对于数、理、化的发展并无特别的、直接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对于这个“突发的革命”指的是什么,它的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康德在序言中第一段引文之前已论述得很清楚了。

康德认为,数学曾长期处于盲目探索的阶段,只是由于一个人幸运的思想引起的革命才使之产生转变。虽然“这种智力革命及其幸运创造者的历史未留传于世,但其重要远过于发现回航好望角的航道。”^⑧而数学革命(康德在这里举的是几何学的例子)的特点就在于数学“不去检验在图形或在图形的概念中所见的事物,并以此理解图形的性质;而是去发现必然包含在他自己先天地构成的概念中的东西。他以自己的建构方法把概念放入图形,以此使图形呈现于他。如果他要以前天的确定性认识任何事物,那么除了必然由他自己根据他的概念所加入的图形的东西而外,绝不需再给图形附加任何东西”^⑨。

康德认为自然科学进入学问大道为时甚晚,但亦可谓智力革命突变的结果。在举了伽利略、托利拆利和斯塔耳等人的例子之后,康德总结说,自然科学革命的

本质特征在于：“他们(指上述自然科学家——作者注)认识到：理性只能洞察按其自身计划产生的事物，它决不容许自己被自然支配，它必根据固定法则的判断原理指示其道路，强迫自然回答理性自己规定的问题。凡不遵从所预先设定的计划而偶然观察，决不能产生必然的法则，而理性则只关注于去发现此法则。……凡是不能从理性自身之源得知的东西，只有从自然中学得。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去探求而不是虚构事实时，理性必须以它自己放入自然中的东西为指导”^⑩。

很清楚，数学革命也好，自然科学的革命也好，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即思想方法和观点上的革命。康德因此说他的《批判》“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只是“一部论方法的论文”^⑪。可见，康德在第一段引文中所说的“革命”无疑是指这个思想方法上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根本特点就是有关对象的先验的知识不能到对象本身中去找，而要到理性本身的建构活动、理性根据概念放入对象的东西中去找。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知识。我们对自然的知识不是像幼儿被引带所牵引那样，依靠自然的牵引，而是按照理性自己的计划向自然提出问题，逼它回答。这就是理性对于自然界的所谓“立法权力”。康德认为，如果把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加以概括，加以扩充，就能提供新哲学所需要的那种方法。他指出：“根据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所立的例子，使形而上学完全革命化，以改造以往在形而上学中通行的进程，这个企图是批判纯粹思辨理性的主要目的”^⑫。康德认为他在哲学革命的进程中和哥白尼相似的地方，是在于当哥白尼看到陈旧的理论毫无结果时，就毅然提出新的假设来代替无用的旧理论。“天体围绕观察者旋转”的理论既然是无效的，那么可以反过来设想：“观察者旋转，星球静止不动”。康德则发现：以往所假定的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与对象一致的理论并不能扩大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因此也反过来，用新的假设来代替旧的理论：“对象必须和我们的知识一致”。显然，康德在这里和哥白尼类似的地方只是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即当现存的理论不能令人满意时，便将其抛弃，而提出一种新的假设来试验一下。他在第一段引文中所说的可以同样在形而上学中进行的试验指的就是这么一种方法上的试验(关于这一点，下文还有进一步的论证)。而他的哲学革命的精神实质，则是同促进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革命相一致的，即必须把理性认为有自行规定其法则的权利，必须把对象看为要适合人类的思想，而不是把人类思想看为要适合独立的实在。任何有哲学常识的人都会轻易地指出：这是唯心主义。这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但进一步思索，我们会发现这里讲的显然是以知识武装起来的人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根据人们已有的知识改造外部世界，从而创造第二自然。如果我们具有更加深刻的历史眼光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国革命的德国

理论”不啻是在封建统治沉重桎梏下的黑暗王国里燃起了一把人本主义的希望之火：在抽象晦涩的字句下面，隐藏着“砍掉自然神论”和“杀死天国全体守备部队”，使“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的大刀！

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对康德哲学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但他也同样没说康德曾自诩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他只是说：“他把他的哲学和哥白尼的方法相比较并非是不恰当的”^⑩。注意！是“哥白尼的方法”，而不是“哥白尼的革命”或“哥白尼的学说”。这实际上不但回答了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问题，也回答了与此密切相关的所谓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假设”的问题。说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是因为人们往往因为后者而得出前者这样的结论。所以，这后一个问题不解决，前一个问题还不能说是最终得到了解决。

三

N·K·斯密司作为一个哲学家可以说名不见经传，但作为《批判》一书的英译者和解释者，却颇有名气。他的英译本《批判》成为很多人研究康德的依据，而他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曾作为许多大学哲学系的课本。但他却在译我们上引的第一段引文中犯了一个错误。第一段引文中“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这一句德文原文是“mit den erste Gedanken des Kopericus”。其中“Gedanken”这个词相当于英语中的“idea”、“speculation”、“notion”、“reflection”等词，即“思想”、“想法”的意思。因此这一句毫无疑问应译成“哥白尼最初的思想(或想法)”。德国人卡尔·J·弗里德里希就把这一句译成英文的 the first thought of Copernicus(哥白尼最初的思想)^⑪。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仁源译的《批判》中文本，因为是直接根据德文原版译的，所以这一句也正确地译为“哥白尼最初的思想”^⑫。但斯密司却把这一句译成了：“Copernicist’ primary hypothesis(哥白尼的基本假设)”^⑬。蓝公武译的《批判》的中文本是根据斯密司的英译本译的，所以也跟着错了，并因此作出了许多不正确的解释。康德把自己的学说比作“哥白尼式的假设”的说法，斯密司无疑是始作俑者。也许有人会说：就算如此，那么所引的第二段引文又作何解释呢？

我们认为，第二段引文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要求得事物的根本法则，不能用感官的也即经验的方法，而要与感官相反的方法，即用理性的也就是先验的方法。这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他的哲学所提倡的新的思想方法；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他在《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只是作为假设(实际上不是假设，这